

“改造劳动”：路翎在1950年代的工厂经验与劳动叙事

路 杨

[内容摘要] 从1940年代的矿区写作到1950年代的下厂实践，路翎的文学实践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劳动叙事”，在以书写城市工人革命为主的左翼文学模式之外，提供了关于阶级、革命、历史以及“人”的不同理解。路翎对“劳动”之悖论性的文学化诠释、对“劳动者”内部的现代主体的发掘，及其对“劳动共同体”的建构，呈现出战时工业的内迁与重组以及新政权下的阶级政治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尤其是工农、城乡、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新结构与新矛盾。在“劳动-政治”的意义上，路翎的写作打开了某种阶级论以外的、更富于涵容力的政治构想，即以劳动或劳动者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方式，以“改造劳动”作为继续革命的场域，提供了新的问题视野、主体意识与共同体想象。

[关键词] 路翎；战时工业；下厂写作；劳动叙事；劳动共同体

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关于城市工厂及工人生活的表现中，工人革命的场景大多占据了叙事的中心，而对工人劳动鲜有刻画。在这种“缺席”的状况下，路翎194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对工业劳动的书写成为难得的“在场”，展现出独特的经验视域与劳动叙事图景，将“劳动”发展为一种别样的主题、价值、革命历史观念与乌托邦想象。

一、战时矿区写作与“劳动”叙事的断续

自1937年11月起，工业合作社运动的开启与战时工业的大规模内迁，使中国工业原本集中在城市中的生产空间大大扩展，也为工业劳动话语在新文学中的展开提供了契机。路翎于1940年代在西南地方矿区的文学活动为战时中国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工业经验与劳动观察，也显示出与同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同的问题脉络、话语资源与思考路径。路翎的整个青年时代一直与煤矿或工厂有着某种不解之缘。1940—1944年，路翎经继父介绍，先后在位于重庆北碚后峰岩的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以及燃料管理委员会北碚办事处的黄桷镇管理处做小职员，经常造访天府煤矿公司下属的后峰岩煤矿。1946年迁回南京后，路翎再次借助继父的关系，在燃料管理委员会南京办事处谋生计。1946年年底，路翎在写给胡风的信中带着一点自嘲地写道：“当成公务员了，而且又是‘煤炭’。真是命里注定的样子。”^①无论是在文学经验的积累还是文学空间的垦殖上，矿区与工厂都为路翎的写作提供了相当丰厚且不可多得的资源。

^① 路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南京》，载《致胡风书信全编（路翎）》，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作为一个相当早熟的作家，路翎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是伴随着抗战时期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尤其是工业内迁展开的。1938—1942 年，西南地方尤其是四川迅速成为战时中国大后方的工业中心、钢铁工业中心以及机器工业的主干。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位于战前都市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迁往西南，中国的产业格局与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对于战时从南京到武汉转宜昌再到重庆一路辗转的路翎而言，这种迁徙、流亡的经历与后来在重庆驻留多年的矿务工作，显然为之打开了一个与过去的城市学校生活殊为不同的经验世界。在这种由战时迁徙带来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中，产生了大量像《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这样拥有复杂的社会阅历和强烈的流浪汉气质的工人，也给路翎在重庆北碚的矿区生活带来了别样的文学观察与经验视域。正如胡绳所观察到的那样，路翎小说中的工人形象“是分属于两种型的：一种是流浪汉气质的工人，一种是刚离开土地不久的农民气质的工人”^①。换言之，正是在战时工业内迁的视野下，路翎发现了战时工人群体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其中既有随工厂迁来的大量外来产业工人，更有“来自当地的破产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还有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难民，以及因躲避兵役而拥进城市的乡村人口”^②，并各自携带着强烈的地域意识与行帮观念，也由此引发了外来工人与本地农工之间的剧烈冲突。这既在工人群体内部带来了意识状态的多样、芜杂与不稳定性，也为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觉醒”带来了现实与叙事层面的双重难题。在路翎笔下，像《卸煤台下》里的孙其银、《饥饿的郭素娥》里的张振山这样的工人，虽然的确被赋予了一定的先进性，但其强烈的个人欲望、强大的自我意识、无法在群体中完全安置自身的精神困境，往往很难使其从个人的觉醒跨越到阶级的觉醒，小说也由此产生了一种“个”与“群”之间的悖论关系。这使路翎的小说与一般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其笔下的“劳动者”也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典型的进步工人形象。对于这种“非典型”的革命主体^③与其所处的劳动生活之间的关系，路翎构造了一种叙事上的悖论：小说既以劳动者强悍的生命力与反抗力为西南矿区充满罪恶与苦难的“劳动世界”^④带来巨大的扰动，但最终又不得不在叙事上对其命运加以放逐。与之相应的是，路翎小说中的劳动想象与劳动叙事本身也是充满悖论性的。工人的劳动时而被刻画为充满生命力、自由感与创造性的活动，时而又呈现出一种处在剥削关系中充满痛苦、压抑的异化形态。张振山这样强悍的工人虽能在工业劳动的过程中得到生命力的释放，但并不能完全依靠劳动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更无法解决自身的尊严问题，获得具有合法性的社会位置，最终只能选择出走。矿区这一庞大、神秘的工业劳动世界给西南地方的农村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尤其给《饥饿的郭素娥》里的魏海清这样农民出身的工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但在郭素娥那里又被赋予了某种关于新生活的想象与朦胧的远景。质言之，路翎的小说构造了一种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劳动”既是浪漫的又具有高度复杂的现实性；“劳动者”既具有朴素的阶级认同，但更是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现代主体；对“劳动世界”的想象既带有浓厚的乌托邦属性，又包含无法消解的反乌托邦话语，显然无

① 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大众文艺丛刊》1948 年第 1 期。

② 齐武：《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五卷 [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6 页。

③ 关于路翎小说中“非典型”的革命主体问题，可参见路杨：《“非典型”的革命主体——战时工业视域下的路翎小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1 期。

④ “劳动世界”的说法见胡风为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所作的序，可参见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

法提供某种清晰的历史远景。这也就意味着，路翎1940年代的矿区写作尽管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模式之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经验视域与劳动叙事，但其小说在“劳动”的现实性与未来性之间显然还存在逻辑与叙事上的空缺，对于中国工人的主体觉醒与工人社会的远景问题亦缺乏文学上的有效方案。到1940年代中期，路翎的劳动叙事出现了某种中断，或许也与这种写作和思想上的困境有关。

直到1948年5月4日，路翎写下了《泥土》。这是一篇短小、精致甚至带有某种寓言色彩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砖窑工人徐吉元如何在一次失败的爱情告白之后醒悟过来，并在毅然辞工后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活的自由感。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劳动”辩证法的主题，即人与生产资料之间又爱又恨的那种复杂的情感关系：砖窑作为工人的创造物，像“他底孩子”和“亲爱的活人”一般难以割舍，然而又是那么沉重地压抑着他。在这种剧烈的情感变化之中，工人发掘了自己痛苦的根源：“我不是主人！”^①并继而在雇主惊愕的蔑视中挣脱了被奴役的地位，恢复了与“泥土”之间的亲密关系。尽管这种反抗意识的觉醒太过轻巧突兀，但路翎借此补上了《饥饿的郭素娥》中那空缺的一环——这不仅仅是“觉醒”时刻的终于到来，更重要的是对一种“做主人”的强烈渴求与自觉意识，一种颠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关系的变革冲动。“做主人”的呐喊与小说题目中的“泥土”一同，宣示出工人对占有生产资料、变革生产关系的主动诉求。有了对这一空缺的填补，路翎才有可能更接近一个“劳动乌托邦”的想象。在1949年前后，路翎也正是以极大的热情和新的视角，重新投入曾在1940年代中后期有所中断的劳动叙事当中。

二、下工厂：“问题小说”式的政治实践路径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在胡风的推荐下，路翎到南京军管会文艺处担任创作组组长。在同年5月写给胡风的信中，路翎说：“我在这破楼里闷得久了，是极想走过广大的新生的平原，见到新的事和新的人的。”^②而在路翎的设想中，这个“广大的新生的平原”不是别的，正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的、现实中的“劳动世界”。在1949年写给胡风以及其他友人的书信中，路翎兴奋而频繁地提到自己“下工厂”的计划：

南京的情形，也如总的局面一样的困难。和负责的人谈了，到工厂去他们原则上同意，并且已拟了计划，但要我先干组织工作之类，又成立了一个很不具体的编创组，要我负责。我想设法使这个东西不着重于形式，而大家到实际工作中去，但还没有机会更深入地谈。^③

在争取入厂，已和总工会接过头，预备从后天晚上起先到附近的厂里（被服厂之类）去参加他们工作组的工作。但领导人现在的心思似不在这里，虽然表示过赞同，但又不置可否。较远较大的厂原已选定马鞍山□厂及铁厂，但要过些时，处内问题具体解决后才能提出。^④

我已在此地自作主张地通过总工会参加了几个工人活动。自作主张，是因为领导人不置可否，

① 路翎：《歌唱》，《蚂蚁小集》第三期（1948年8月）。

② 路翎：《致胡风（1949年5月14日，南京）》，载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③ 路翎：《致胡风（1949年8月6日，南京）》，载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155页。

④ 路翎：《致胡风（1949年8月15日，南京）》，载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157页。

因为即将改组。……

我们准备等处里的情况定了，到个别的厂里去住些时。工会是帮忙的。问题在领导上。不知今后会如何。具体的问题，例如去厂里吃饭，比较难解决。……

庄兄在那被炸了好些洞的电厂里做工，我也想争取一个机会去电厂里住住。^①并且也建议朋友下厂实践，例如信中提到的“庄兄”即欧阳庄去财政经济组之前，路翎便希望他可以“做实际工作，最好在工厂里面”^②。

在 1949 年刚刚解放的南京，作家“下工厂”显然和解放区作家在抗战胜利后有组织地进入各个新解放区的农村土改与工厂接收工作不同，更未像 1950 年代之后那样普遍地成为作家们“深入生活”的写作方式。路翎的这一选择显然带有强烈的自发性。从路翎与其文学友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下工厂”是这一批以胡风为中心的作家群体尤其是路翎非常自觉的选择。从负责部门的工作安排来看，路翎当时所在的文艺处其实并不完全支持作家“下工厂”，文艺处领导对于路翎的要求总是不置可否，这些实践甚至还是路翎自己争取或“自作主张地通过总工会参加了几个工人活动”^③。如果说 1940 年代初，路翎在矿冶研究所当职员际遇使他获得了深入矿工生活的机会和可能，为他打开了劳动叙事的天地，那么到 1950 年代初，工厂生活则成了很多七月派作家的一个共同选择。这批作家纷纷要求“下厂”体验生活，而在这些现实体验中，“工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亟待表现的文学空间，同时还是一个现实政治空间；这些作家的“下厂”写作在将工厂作为一个文学实践场域的同时，更是将其作为某种政治实践的场域。事实上，欧阳庄、曹白基本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部门和具体的管理工作，并由此正式转向了实际的政治工作。^④

对于路翎而言，“下工厂”已经不单纯是作为作家发现素材、体验生活意义上的写作准备，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政治实践。路翎开始为其 1940 年代劳动叙事中所积累的现实观察与浪漫想象，寻求一种能动地介入历史与现实的实践可能。这使得路翎在工厂中所做的观察也大多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学性的。在写给胡风的书信中，路翎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工人生活的意见，并主要是针对工人的政治生活的。在参加过南京市与浦镇铁炉机场的工人干训班与“诉苦大会”之后，路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厌恶‘诉苦’，那是勉强的，至少是不好的。前天，一位司机说着他的苦，情绪激动，一直说到解放后的苦，似乎现在更苦，哭了起来。这个简直就压杀了工人阶级底战斗气魄和英雄气魄。”^⑤或许正是不满于这种工人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对于“诉苦”这类农村基层工作经验的某些机械化的搬用，路翎从 1949 年开始创作了一系列剧本和短篇小说，并努力争取拿到工厂中上演，或是将剧本或小说念给工人们听。一方面这诚然是为了征求工人读者的意见，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希望通过具体的文学实践，为工人的政治生活找到一种更贴近工业生产与工人实际的新的组织形式。

① 路翎：《致胡风（1949年8月18日，南京）》，载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159—160页。

② 路翎：《致胡风（1949年5月14日，南京）》，载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148—149页。

③ 路翎：《致胡风（1949年8月18日，南京）》，载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159页。

④ 欧阳庄于1949年前后担任地下党南京下关发电厂的负责人，带领全厂工人护厂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担任南京下关电厂的党支部书记兼厂长。曹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冯二郎的名字，担任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处处长，并历任华东工业部重工业处善保会军代表、轻工业处处长、华东局财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财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⑤ 路翎：《致胡风（1949年8月18日，南京）》，载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159页。

从1949年到1953年，在奔赴朝鲜战场之前，路翎主要创作了11篇工人题材的短篇小说与3部工业题材的话剧，其中小说全部收入《朱桂花的故事》结集出版。1949年10月在给胡风的书信中，路翎谈到他下厂的感受：“这厂是被服厂，生产的性质不够理想，但东西还是有的。”^①应当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路翎还是更希望能塑造出马克思主义论述中的“产业工人”形象，即所谓“新的事和新的人”。换言之，依托于现代工业体系的“技术工人”“机械工人”或“产业工人”才是路翎设想中成熟而理想的历史主体，即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与在新的生产关系之下的历史主体。然而路翎1940年代的小说触及到的战时工人内部群体的复杂构成与陈旧的积习，却没有随着1949年的“解放”而消除。在下工厂中，路翎仍然观察到工人个体身上携带着“封建的手工业性”“小市民性”“少爷气”“学生气”，乃至“帮会”习气，^②并指出，工人只有涤净这些在长期的奴役下形成的历史重压与精神创伤，才可能生成新的历史主体。然而这一主体的更生无疑是艰难的，并不是以某种“公式主义”的写作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路翎在1950年代的文学实践与其在1940年代的战时矿区写作相比，在理念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路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近于某种工人/工厂题材的“问题小说”，其写作方式与关注点不仅来源于“下工厂”的生活体验与现实观察，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基层调查与研究的性质，可以视为一种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路翎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观察他曾经在1940年代的劳动叙事中发掘出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些小说和剧作中，路翎通过社会制度的新旧对比，呈现出“劳动”中的异化成分是如何得以消除，并还原为一种健康的、创造性的、富于力量的劳动形态：在《劳动模范朱学海》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手工业者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使劳动者对劳动的感情也发生了翻转；在《荣材婶的篮子》中，生产关系的变化重构了人与劳动、人与机器的关系；《替我唱个歌》《朱桂花的故事》中的工人正是在“做工”中学会“做人”，获得了人的尊严。这些主题对于路翎的工业写作而言既新且旧，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主体“觉醒”环节，路翎的处理则显现出某种悖论性：路翎恰恰借用了他在现实观察中颇不认同的“诉苦”的形式来使劳动者获得其主体意识。在路翎的多部小说与剧作中，每一次促使人物思想转变的方式几乎都依赖于“诉苦”。“诉苦”无疑仍然是触发情感认同继而启发政治意识转变最为有效的方式，其内在逻辑无异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但路翎作品的复杂性在于，“诉苦”并不是对人人都有用。换言之，无论是进步的工人还是落后的工人，都各有各的“苦”，各诉各的“苦”，落后工人的软弱、动摇，甚至是对新社会的不信任，也都包含在他们各自的“诉苦”场面中，这显然导致“诉苦”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方式的有效性打了折扣。在《人民万岁》中，刘冬姑虽然多次“诉苦”，但她的苦更近于无人理解也无法倾诉，真正触发她转变的并不是其他工人通过“诉苦”试图对她进行的教育，而是李迎财的死带来的残酷的现实冲击。在《英雄母亲》中，落后的朱发山也多次“诉苦”，甚至替流氓无产者“诉苦”。而这些充满矛盾与悖论的“诉苦”场景常常会对小说的意义图景造成干扰。

然而在以《女工赵梅英》《锄地》为代表的一部分小说中，路翎则发掘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① 路翎：《致胡风（1949年10月28日，南京）》，载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179页。

② 路翎：《致胡风（1949年8月18日，南京）》。

在《女工赵梅英》中，路翎塑造了一个“小市民性的女工”^①，并通过她与农民出身的干部朱新民之间的矛盾及其自身的思想转变，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工人内部是否存在新的阶层分化？在工厂的“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间，军事代表、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是否产生了新的等级关系？“主人”意识到底源自政治宣传的灌输还是人民自觉的体认？干部与群众之间到底是服务还是管理的关系？而在这些问题之外，最引起争议的还是赵梅英的工人形象问题。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赵梅英基本被塑造为一个消极怠工、庸俗而蛮横的小市民女性，然而当赵梅英因为怠工和朱管理闹事被大家孤立之后，小说的后半部分则进入了她的精神世界，赵梅英开始被塑造成一个寂寞的、要强的、可怜的、可以被理解的女人。小说由此试图讲出，赵梅英是如何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泼辣、蛮横、胡搅蛮缠、蛮不讲理的“下流的女人”。路翎带入了她生活与精神的前史，试图解释一个落后的“旧劳动者”内心的分裂和演变的逻辑，并由此进入了他所擅长发掘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层面：“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着她呢，她重新因绝望而快意，因绝望而狂暴了。”^②“和所有的人敌对着的人，他的心里必然是疯狂的。”^③然而在这篇小说中，在这个由“精神奴役创伤”到“疯狂”的发展链条中，路翎还加入了一个群体对个体的孤立与压抑。因此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到底是旧的精神奴役创伤阻止了赵梅英进入新的秩序，还是新的劳动秩序造成了某种新的精神奴役创伤？“解放”是否意味着必须进入并服从于新的秩序？作为一部以“改造”为主题的小说，一方面，《女工赵梅英》没有体现出“教育改造”的积极介入——小说结尾赵梅英“改改看”的决心预示着“改造”的发生，然而与其说是“被改造”，不如说是自我的觉悟；另一方面，这个“改造”的过程又被叙述为一种新的压抑机制，赵梅英的觉悟也仍然是在“个人独立”的意义上发生的，即由于害怕失去独立而有尊严的生活，才选择服从于秩序。由此可见，实质上的矛盾并没有被解决。换言之，新秩序似乎并没有真正将赵梅英这样的女性从她所受到的精神奴役创伤中解放出来，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压抑性。

三、“劳动共同体”：劳动秩序的分化与重建

在路翎的其他一些小说和剧本中，“赵梅英”“刘冬姑”这样带有沉重的旧根性和歇斯底里气质的工人形象，几乎从一开始就招致了各种批评的声音。唯有写于 1950 年 2 月的《锄地》一篇是路翎自认为很“简单”，却在初问世时得到了“明朗”“喜欢”这类评价的小说——这大概也是路翎 1950 年代工厂题材的小说中唯一得到过好评的作品。但实际上，这篇小说的“问题性”似乎更尖锐。小说讲述的是医务室干部刘良与女工吴秀兰之间的一件小冲突如何引发了刘良思想上的转变。与吴新民和赵梅英相类，刘良与吴秀兰这组对立的形象代表着（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未参加过革命的）工人群众与（没有文化、参加过革命的）农民干部之间的对立冲突。他们之间的争论也是围绕着工人/农民、群众/干部、有文化/没文化、被拯救者/革命者的对立展开的。在刘良思想转变的起点上，路翎写出了导致冲突发生的思想根源。

但这件事情的对和错，还不太有关系；这件事情是很小的，生起气来人总要说错话的。使他

① 路翎：《致胡风（1949 年 11 月 15 日，南京）》，载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 181 页。

② 路翎：《女工赵梅英》，载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知识书店 1950 年版，第 66 页。

③ 路翎：《女工赵梅英》，载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第 67 页。

难过的主要原因，他虽然学习过理论，知道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知道工厂工作的重要性，但总是和工人们搞不好；好像这些工人并不是理论中所说的那些工人。到这厂里来三个多月了，平常除了和几个老同志自己谈谈以外，和任何工人都没有什么接近。他甚至有些害怕这些工人，有时候就憎恨他们。他想，这些工人，无论穿的、吃的、住的都要比他乡下家里，比他父母好得多了。家乡在闹水灾，有的地方连杂粮都吃不上，但这些工人却生活得这样安定。他们农民为了解放中国流了这么多的血，工人们舒舒服服地享受革命的果实，还要被称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他心里时常想不通的。这些苦恼的思想，就是今天这吵架的根源。^①

在刘良的这些委屈中，我们可以发现上述那些差异与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新秩序中的阶级话语（如“主人”“领导阶级”）、等级划分（生活水准的差异）和制度规范（干部要替工人服务，工人有错干部也要受批评）所强化了。阶级话语在赋予“工人阶级”以历史主体的命名与尊严感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潜在地压制了其他阶级的合法性位置，尤其无法解决革命战争时期作为革命主体的农民的阶级地位问题。换言之，刘良在理论与现实中对于“工人阶级”的不同认识，恰恰显示出“工人”在革命理论中被赋予的主体位置与其在革命实践中实际发挥的作用之间的不匹配与不平衡。实际的革命主体与新的历史主体之间的不统一与迁移，造成了不同阶级之间的等级关系与新的权力结构，以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革命与建设之间的悖论。在具体的权力结构中，农民是干部，是工业生产中的实际领导者与管理者，工人是群众，是工厂中的被管理者与被组织者；而在阶级话语中，工人阶级是“主人”与“领导阶级”，而干部则是服务者。阶级理论一方面赋予工人一种主人翁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工人之“主人”意识的高扬又势必会导致对领导/被领导、管理/被管理这一具体的权力结构的反抗。工人主体性的加强，既构成了对其他阶级的压制，也构成了对权力秩序本身的挑战。而这一主体性的增强正是由阶级地位的提升带来的尊严感的高涨为具体表现的：“我们工人不能讲话吗？”“你是不是替工人服务的？”^②饶有意味的是，刘良和工人们的争论最终都触及了一个“配不配”的“资格”问题。面对工人们的质问，刘良反问道：“什么工人阶级做主人！这配做主人吗？你们工人是哪个解放的？”吴秀兰则反驳道：“你不配解放哪个，你不配……你穿上这身干部衣服是白穿的！我问你，你够什么资格……”^③质言之，这一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冲突在根本上是关于主体位置的争辩。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路翎解决上述矛盾的方式。路翎在叙事中设置了一位恰恰处在上述这一对立结构之外的老工人刘玉根。作为刘良转变的叙事推动力，正是刘玉根对刘良的开导，揭示了“劳动”超越城/乡、工/农在阶级属性、阶级地位、文化程度以及革命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性的普遍性意义：“工人都是不错的，都是劳动人。”^④由此，“劳动人”提供了一种具有通约性的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感，可以容纳乃至消解上述一系列差异与对立。这一身份归属既能够容纳刘良这样的革命农民，又能唤起刘良对于工人阶级的情感认同。最终，在一群沉默的“掘地的人们”的劳动形象面前，刘良以参与劳动的方式回到了“劳动”的共同体当中去，以“劳动”抹平了阶级

① 路翎：《锄地》，载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第113—114页。

② 路翎：《锄地》，载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第110、111页。

③ 路翎：《锄地》，载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第111页。

④ 路翎：《锄地》，载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第117页。

内部的等级区隔与差异性。

突然地他站起来了，迅速地脱去了棉制服，走过去拾起了地上的一把锄头，向着土堆那边走去了。

当他抓起了锄头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底心里充满了力量。掘土的工人们都停下来看着他，他们对他微微一笑了一下，扬起锄头来就对着土堆掘去。那微笑长久地留在他底嘴边了，并且他底脸色更鲜明了，他第一次感觉到，并且是这样强烈地感觉到，这里的一切人们，都是他底兄弟。工人们继续掘起土来，而且立刻充满了热烈的、生动的感情了。

工人们唱起歌来，叫喊起来。刘良沉默着，但是他心里在唱歌。他每掘一下他心里面就要叫喊一声，而且后来一直大声地嚷出来了。……一下子掘得那么多，工人们都望着他欢呼起来。这呆板的青年现在又变成一个充满了生命的孩子了，他像狂风一样卷着那一堆泥土，浑身都汗湿了。他觉得他底心里有着狮子一般的力量。

“各位同志！”他歇下来喊着，“我要……克服我的缺点，向大家学习！”^①

在这个意义上，“劳动”的确近于一个可以使被压抑的个体重新获得生命力的乌托邦，换言之，即以一种普遍性的平等，突破那些可能带来压抑的机制。但这里的“劳动”也必然只能是去除了专业化背景、能够普遍从事、缺乏技术性要求的简单劳动——“锄地”，而不可能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和经验性的工业劳动、机器作业或手工劳动。因而这种经过筛选的、被抽象化的“劳动”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话语。正如现实中的劳动分工势必会带来差异，无分工、无等级、能够被普遍参与的劳动，只可能存在于乌托邦之中。而以“掘土的人们”为代表的工人形象或“劳动人”，也正是一个抽象化的、被抹去了个体差异的集体形象，是经过了筛选的、由“剩下十几个人在劳作着”的人们构成的“真正的劳动者”形象。这的确是一个有力量的、能够唤起认同的、沉默而坚实的集体，但与现实中那个意识状态混杂的、乌合之众式的群体之间仍然存在难以跨越的距离。

然而这还并不是问题的终点。“劳动”固然造就了沟通工农的共同体想象，但这一共同体的建立，在小说叙事中却恰恰是通过工农双方的自我否定达成的。在刘良意识到“我要克服我的缺点，向大家学习”^②的同时，吴秀兰也在展开自我反思：“我们念过两天书，就了不起了吗？工人阶级不是这样的！”^③刘良承认了“农民意识”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而吴秀兰的思想变化则肯定了农民的革命经验，对工人阶级的优越感产生了省思。在这一叙事安排中，劳动的共同体是通过消除工/农、城/乡差别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在“革命”的意义上肯定了农民的革命经验而将其接纳进来，农民则在“现代”的意义上扬弃了自我的封建意识，从而获准进入这一共同体。因而实际上，这一看似平等的、消除了差别的乌托邦，仍然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准入”机制。“劳动”作为某种乌托邦话语，现实中的差异性问题的仿佛都可以在其中得到解决，但事实上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中可能存在的自我贬抑、自我取消。在这一点上，《女工赵梅英》中实质性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锄地》也是以被压抑者的自我消除换取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

路翎的小说以“劳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某种重新理解“革命”的方式。然而矛盾的最终

① 路翎：《锄地》，载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第 117 页。

② 路翎：《锄地》，载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第 117 页。

③ 路翎：《锄地》，载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第 118 页。

解决——将“劳动”作为某种超越性的乌托邦，却在根本上搁置了阶级的问题，甚至消解了阶级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女工赵梅英》《朱桂花的故事》等一系列小说后来之所以会遭到愈演愈烈的批评与攻击，甚至上升到“工人阶级的敌人”“污蔑劳动人民”^①这样严厉的批判，并不仅仅在于其中对“工人形象”的具体书写，也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一批判性的写作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规的冒犯，而是由于这些小说以一种“问题小说”的方式，将很多历史与现实问题尖锐地揭示了出来，而与正处在建设中的政治图景及其文化表述构成了某种抵牾。然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路翎的写作方式诠释了一种新的文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反映现实中的问题，而且能对现实产生改造的作用——一种能动的现实主义。这或许也是七月派作家的文学实践中的政治实践内涵。王丽丽在其关于胡风的研究中指出，胡风事件并不是“由单纯的文艺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而是几乎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文艺政见的分歧，因而不可否认的主要属于政治问题”^②。这看起来似乎导向了另一个问题，但在“劳动-政治”的意义上，路翎的小说就其文艺内部的政治性在客观上也可能构造了一种阶级论以外的、可能更富于涵容力的政治构想，即以劳动或劳动者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方式，以“改造劳动”（而非“劳动改造”）作为继续革命的场域。平等问题、尊严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或许都将在这一场域中获得新的政治想象力。这可能也是“劳动”作为一种乌托邦话语向我们提出的政治期许。

四、结语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建构中，正如蔡翔所言：“‘劳动’承担的不仅是伦理的正义性，也是政治的正义性；不仅发展出对所有制关系的变更要求，也发展出对国家政权的新的形态想象。”^③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这一历史更迭之际，关于“劳动”，路翎的写作保留了殊为丰富的政治文化构想与历史可能性。从1940年代开始，路翎的写作就在左翼文学的脉络内部以一种具有对抗性与独创性的写作模式，提供了一种先于“革命”的“劳动”想象，折射出关于阶级、革命、历史以及“人”的不同理解。路翎对于“劳动”之悖论性的文学化诠释、对于“劳动者”内部的现代主体的发掘，及其对于“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展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学想象与观念形态。路翎的劳动叙事显影出战时工业的内迁与重组以及新政权下的阶级政治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在社会结构变动、现代工业文明对乡土世界的强烈冲击之下，路翎写出了“农工”群体的大规模产生、农民革命者进入工业秩序等如何加剧了工人阶级在构成与话语上的复杂性，并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构成工农、城乡、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新结构与新矛盾，也构建出了一种新的问题视野、主体意识与共同体想象。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① 参见林汉标：《路翎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日报》，1955年7月2日；晓立：《路翎污蔑劳动人民的阴险手法》，《文艺月报》1955年第9期。

② 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③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页。